

北伐战争中的加伦将军

钟小敏

加伦，是苏联将军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在国中的化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受苏联军事委员会的派遣，来华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为北伐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4年8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请求，委派加伦赴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以接替同年5月到广东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工作而于7月在东江不幸牺牲的军事顾问团团长沙甫洛夫。加伦于同年10月到达广州后，首先分析和估计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力量 and 与孙中山为敌的各军阀的兵力，认为当时广东的前线形势是稳定的。但到了11月，东部战线形势出现了恶化的苗头：陈炯明正积极进攻广州，遭到广东革命政府痛击的商团也蠢蠢欲动。加伦密切地注意到了情况的变化，并在分析了各个战线的形势和革命力量之后，对孙中山打算立即北伐的主张，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只有在后方（广东）十分巩固和邻省的形势有利于北伐的情况下，北伐才能奏效。现在，这些条件一个也不具备，更何况也没有兵力。因此，在国民党完全控制广东和消灭陈炯明之前，北伐的问题，应暂时搁置。随后，加伦同他部下的军事顾问们一起起草了《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报告，制定了北伐进攻计划的有关方案。加伦在论证从广东出征的种种有利条件时，既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状况，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所持态度，以及他们对北伐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估计。这个报告还包括广东的财政能力和所需经费，扩充军队的计划，北伐开始前邻近各省的大致情况，湘赣两省兵力，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卫广东和实行北伐的兵力部署等。

1926年3、4月间，国内外敌人为了扑灭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采取了反革命的联合行动。英、日等帝国主义唆使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组成直奉联军，将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的国民军赶出京、津地区。之后，他们又布置由张作霖会同张宗昌进攻退守在张家口一带的国民军，由吴佩孚进攻湖南的唐生智，最后联合盘据于东南五省的孙传芳和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围攻广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粉碎各地军阀的军事包围的企图，把革命推向全国，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准备举行北伐战争。1924年4月，蒋介石、李济深等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以及苏联其他的军事顾问们，制定了北伐的计划，提出了“进军湖北，占领湖南和江西”的计划。加伦认真研究了 this 计划，发现它有一个可能招致失败的根本错误，即北伐军几乎是平均分配兵力同时对湖南的吴佩孚和江西的孙传芳作战。当时北伐面临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两湖及直隶南部的吴佩孚，拥兵20万；二是控制东南五省

的直系孙传芳，拥兵20万；三是盘据东北、华北一带的奉系张作霖，拥兵35万；另有派系纷杂的地方军阀数万。加伦指出，在敌我力量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若平分兵力，同时进攻孙吴两大军阀集团，不仅不能同时摧毁敌人，相反还会授敌之隙，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加伦建议处于劣势的北伐军必须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攻吴佩孚，再打孙传芳，最后歼灭张作霖。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11日占领长沙。27日加伦同蒋介石等赶赴前线。在以后每天的行军命令中，加伦总是被摆在仅次于总司令的位置上，因为蒋介石认为“布留赫尔的合作将对北伐胜利起决定性的作用。”^①然而，在打下长沙后，是按原计划先鄂后赣，还是先赣后鄂，或是同时进攻鄂赣，在国民军内部发生了争论。8月12日，在北伐各将领参加的长沙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是否执行既定方针的问题。唐生智力主鄂赣同时并进，以便蒋介石去打江西，他好独占两湖。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向江西谋个人出路，也主张鄂赣同时并进，还有一些人则坚持既定方针先鄂后赣。加伦要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利害关系下，协助制订正确而又能为各派将领所接受的作战计划，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最后，加伦力排众议，坚持以夺取武汉、消灭吴佩孚为主要目标，再进兵江西消灭孙传芳的既定方针，并制定了从长沙向武汉进军的计划。执行这个方针，一是在战略上保证了向武汉以至后来向江西的胜利进军，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北伐军各派系，特别是蒋介石和唐生智暂时结合在一起，并力进取武汉，不致因争夺地盘而过早地分道扬镳。

长沙会议后，在加伦将军的具体布置和指导下，北伐军长驱直逼武汉。8月30日夜，在距武昌东南约50公里处的梁子湖和黄塘湖之间的战斗，北伐军又由于加伦的正确指导而迅速取胜。在这里，吴佩孚构筑了三道设有铁丝网障碍物的战壕，加之战地丘陵起伏，湖泊纵横，地形狭窄，进击部队没有多大机动的余地，可谓易守难攻。加伦决定以夜袭突破敌军阵地，以避免白天攻击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为保证夜袭的成功，他还指示各师顾问与分队指挥员向战士讲解夜间战斗的性质、特点和注意事宜。晚12点正，北伐军发起突袭，凌晨突破了全部防御工事，残敌丢盔弃甲，躲进了武昌城。

8月31日，第四军、第七军主力抵达武昌城下。9月3日，北伐军第一次攻城失败。当日晚，加伦随总部抵达武昌城南的余家湾车站。在前敌重要将领会议上，加伦详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如侦察不力，任务不明确，部队行动不一致，整个训练水平较差等，要求迅速予以补救，但他的正确分析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时，蒋介石武断地命令48小时内攻下武昌，北伐军遂于9月5日第二次攻城。守敌作困兽之斗，我军伤亡惨重。加伦命令自己的卫队强攻，但几乎全部牺牲。

接着，北伐军6日攻克汉阳，7日进占汉口，但武昌仍未攻下。北伐军总结了两次攻城失败的教训，在加伦的具体部署下，北伐军切实做好了攻城准备，如详细侦察敌军防御中的薄弱环节，加强攻城部队的战术训练等等。10月10日，由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担任先锋，北伐军经过奋战终于占领武昌，实现了加伦“在双十节前打到武汉”的保证^②。是役共俘敌军官兵12000余人，缴获大炮18门，各种枪支7000余支，基本上实现了消灭吴佩孚主力，占领两湖的战略目标。湖北战事结束。

1926年8月底，正当国民革命军西路主力围攻武昌的时候，传来了孙传芳部队在江西省西部边境结集的消息。为了破坏孙传芳支持吴佩孚的计划，不让他有时间集结自己的力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9月初命令东线部队向南昌方向发动攻势，袭击孙传芳布置在南昌九

江一线的部队，开始实施消灭孙传芳势力，占领赣、皖、苏、浙、闽的作战计划。江西遂成为北伐的主要战场。

9月17日，加伦随同蒋介石自武昌起程入赣督师。18日，北伐军占领高安。当时南昌城防务空虚，为贪夺攻克南昌的头功，第六军军长程潜不顾苏联顾问康奇茨的劝阻，擅自更改加伦参与制订的直取德安，截断南（昌）浔（九江）铁路的作战计划，于19日袭占南昌。接着敌我双方在南昌周围展开激战，北伐军两进两出，南昌城得而复失。由于攻打南昌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第二军的支援，致使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几乎全军覆没。加伦9月30日在总结第一次攻打南昌失败的教训时指出，由于程潜擅自对南昌进行袭击，北伐军损失了在主攻江西方面七个师中三个师的大部分兵力。因而有可能导致北伐军在江西前线的彻底失败。加伦冷静地估计了国民革命军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及时制定了扭转危局，夺取江西的计划。根据形势的变化，加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孙传芳把其他一些省的部队都集中到了江西，因而争夺江西的斗争发展成了彻底粉碎孙传芳全部力量的斗争。因而他强调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切不可再冒然进攻。然而，蒋介石并不听取加伦的劝告，背着他下达了向敌人发起总攻的命令。结果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和协调工作，造成各军之间此进彼退，彼退此进的单独行动现象，使得南昌久攻不下。最后，蒋介石在加伦等人的劝说下，不得不于10月13日下达了撤离南昌之围的命令。这时，蒋介石一筹莫展，甚至要加伦代替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加伦虽然对蒋介石背地里的行动非常反感，但大敌当前，仍以北伐前途为重，奔走于前线各地，联络各军，以期彼此协同作战。张国焘回忆：“十月中旬，加伦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所在是各军行动不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两广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要因此垮台了。”^①中共中央和鲍罗廷同意加伦的意见。最后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伦将军在武汉斡旋疏通，使大批人力物力东下应援。同时，他还重新制订了歼灭孙传芳，夺取江西的计划。

11月2日，北伐各军协同作战，仅数日就击败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取得了江西战场的决定性胜利。这一次在加伦全力指挥下取得的江西战场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孙传芳在东南五省的统治，为北伐军进克闽、浙、皖诸省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就整个北伐而言，加伦是实际指导者之一；然而就江西战场而言，他无疑是主要的指挥者。正是由于加伦的正确指挥，使北伐军转败为胜，重振军威。冯玉祥曾在反驳那些以蒋介石的军事才干来说明北伐军的胜利的人说：“抱歉得很，国民革命的成就不应归功于蒋介石，而应归功于国民党和领导军事行动的加伦。”^②

加伦两次赴华担任中国广东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深受北伐军将领、士兵和人民群众的称颂和爱戴。苏联顾问赫麦列夫在1926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加伦外出上街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受到人们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例如，加伦骑马进入南昌时，当地居民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迎接他，这种热烈场面一直伴随他走到司令部，象倾城的居民都在欢迎俄国将领。”^③因为加伦在中国期间成绩显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授与他一枚红旗勋章。

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北伐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有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革命阶级参加的正义战争；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组织推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国民党左派的艰苦努力。所有这一

切都为加伦提供了必不可少和异常有利的活动环境和工作条件，使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北伐战争中得以充分施展。但从加伦本人来说，应该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加伦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加伦幼年家境贫穷，早年便投身革命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因英勇善战而获得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和一枚圣乔治勋章。1916年，他加入了俄共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期间，他担任萨马尔斯卫戍部队政委和赤卫队政委，在同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锻炼成为一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1918年夏，加伦在指挥乌拉尔南部游击队奇袭哥萨克白军后方的战斗中成功显著，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表彰，并荣获全国第一枚最高革命勋章——红旗勋章。之后，加伦历任敖德萨市卫戍司令和敖德省驻军司令，远东军总司令、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和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转战各条战线，功勋卓著，声名显赫。加伦的这些丰富军事斗争经验，奠定了他对北伐作出贡献的重要基础。朱可夫在回忆加伦时说：“他为人真挚诚恳，襟怀坦白，令我钦佩之极。加伦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英勇善战，战功显赫，堪称楷模。凭心而论，这位出类拔萃的布尔什维克，不可多得的同志，才华过人的统帅，是我一向所推崇的人。”^⑤

其次，加伦在制定和坚持正确的北伐军的战略方针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加伦来华后，特别注重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每提出一个建议，每制定一个计划，都要细心地考察和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利弊，从不主观臆断瞎指挥。1925年3月13日，加伦和廖仲恺来到国民革命军，实地考察了部队作战情况。他高度赞扬国民革命军士兵的战斗素质。他写道：“尽管多数士兵见识不广，文化很低，但他们适应要求都异常迅速。士兵很快学会使用新武器，行军中吃苦耐劳……，作战英勇无畏。炮弹、枪弹从头上呼啸而过，他们都镇定自若。防守时沉着冷静，冲锋时勇往直前。只有在军官下令撤退战场时，士兵才离开战场。”他还写道：

“军队中的一些党代表，其素质不仅胜过于上级军官，而且他们作战勇敢，往往以一挡五。甚至更多……在第一团，政治工作才刚刚才展开，然而这个团却已经向人们表明，无须多久，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中国人民必能造就一支捍卫自己的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支军队面前，那些讥讽、嘲笑都将被迫住口，而中国人民的朋友则将发出一片赞叹之声。”^⑦1925年9月，加伦基于对中国军队的充分了解和形势的分析，拟就了具有高度价值的重要文献《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9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他曾设想把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广东省以外，把政治工作的中心自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也就是说，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在国民党领导下，将革命推进到华中广大地区。他对问题的这种考虑，表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而且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活动家。在这个规划中，除了敌我双方的军力对比之外，他还考虑阶级力量的配置，国民党内各派的矛盾，以及各个阶级阶层随着革命发展水平和阶级的变化而在统一战线中立场的变化。北伐战争开始后，加伦将军身临疆场，火线督战，参与指导各重要战役的进行，监督既定战略方针的实施。在攻占南昌时，加伦还多次乘飞机亲临敌军阵地上空侦察，以获得第一手的准确情报，从而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决策。

第三，加伦之所以对北伐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还在于他能够与其他苏联顾问，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通力合作。当时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还有米哈伊尔·斯涅戈夫（加伦的参谋长）、亚·伊·切列潘诺夫（第一军顾问）、戈列夫（第四军顾问）、恩·伊·康奇茨（第六军顾问）、伊万·马马耶夫（第七军顾问）、巴洛夫（第八军顾问）等为数不少的苏联顾问。加伦善于和他们共事，经常同他们一起分析形势，会商作战计划。此外，加伦

还主动争取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协助。切列潘诺夫指出：“我们（驻广东的苏联顾问团）的成效总是取决于同我们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大量的准备工作。”^②“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数不多，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新成立的部队中影响却增长得极快，在党的影响和普及到全体士兵的地方，战斗的胜利就有了保障。”^③加伦同周恩来、张国焘、林伯渠、聂荣臻、王飞等共产党人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和湖南区委互通情报，协商工作。如在江西战场上，加伦曾与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等一同视察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作为苏联政府派驻广东国民政府的高级军事顾问的加伦，他负有执行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使命。不言而喻，他的见解必然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如他不同意武装农民协会和举行农民暴动，主张各地在打倒军阀后建立起比广东革命政府右一些的地方政府机构，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仍大力扶持和积极主张扩大蒋介石的军事实力等。

总之，加伦将军把在中国的任职视为自己革命活动的自然延续，在北伐时期同中国人民同舟共济，为北伐的胜利进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客观地评价加伦，肯定他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对于科学地、全面地评价这一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①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在中国的使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②《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53页。

④③⑨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第41页。

⑥朱可夫《回忆和思考》，俄文版第一卷，第94页。

⑦A·N·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44页。

（上接第85页）

注释：

①《论语》中曾载，鲁国季孙氏旅于泰山，孔子讥之。有人以为这是季孙氏“封禅”泰山，是僭礼，故孔子讥刺。其实不然。按古礼，天子祭天下名山，诸侯祭域内名山大川。季孙氏是陪臣，而祭祀泰山，是僭妄行为，不是什么“封禅”。“旅”只是一般情况下对山川的祭祀。

②“封禅”是指祭天祀地，祀地是祭天的陪衬，主要是祭天。再者，祀地是指祭祀鬼神。《孝武本纪》曰：“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陲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间也，故上亲禅焉”。禅泰山下石闾，因为仙人之间也，否则不禅。故禅地亦祀仙，祭鬼神。此正与封泰山相应，是上泰山求神仙的又一佐证。